

005852

Inner Mongolia Knowledge Youth Encyclopedia

邢野 主编 姜宝泰 副主编

# 内蒙古知识青年通志

## 内蒙古十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邢野 主编  
姜宝泰 副主编

# 内蒙古知识青年通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出版

赤峰市圣宝成置业有限公司 编

---

## 代序

---

# 概述

### 导言

上个世纪 50 至 80 年代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以初、高中毕业生为基础发起并形成的上山下乡运动，这批学生，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知识青年。本《通志》将置身于那段特定历史时段的知识青年，根据他们当时不尽相同的际遇、处境，分为：回乡知识青年、插队知识青年、兵团知识青年、插场知识青年、下放知识青年、社会知识青年、留城知识青年七种类型。由于这七类“知识青年”在当时被冠以不同的定语，则于细微处严格地区分出他们特定的背景与含义。

他们除独具个性之外，惟一的共性是：他们本人无论是已经达到初、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或者是大中专毕业以及小学毕业乃至辍学青年，都被注销城镇户口（回乡、留城者例外），安排到远离城镇、远离父母的农村、牧区去接受贫下中农、牧的“再教育”，或者去生产建设兵团充当一名只穿军装、不戴帽徽、不授军衔的屯垦战士。

《通志》以大事记的形式，将内蒙古地区历时近半个世纪，不同类型，数以百万计知识青年的活动、生息、繁衍、命运的总趋势实录入志，以各个阶段党和国家及各级权利机构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贯穿起来，编织成一副寻觅历史轨迹的链条，以期达到窥一斑而明鉴知识青年运动历史全貌的功效。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知识青年运动风起云涌，他们为推动社会前进所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为改变中国民众命运所建树的业绩垂鉴百代。然而，在1967~1976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年月里，知识青年运动被捆在“文化大革命”这辆“战车”上，走向一条极端、偏激、颓败、沉沦的道路。究其症结所在，还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所致，同时缘于对“知识青年”并“知识青年运动”概念的曲解和扭曲。梁启超先生曾满怀激越、热情喷涌地赞美知识青年：“美哉，我中国少年；壮哉，我少年中国”。他将无尽的期望寄于青少年，他断言惟有中国的少年才能永葆中国鹤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永葆中国力处于喷薄的少年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则将朝气蓬勃的知识青年视为必须依据某一个固定程序重新塑造成一种模式的对象，必须“再教育”一遍方可定格在实施专政者的圈圈之内。那场旷日持久的动乱，又人为地将一代初谙世事的青少年划出等级，将农村、牧区、兵团与城市界定为天壤之别的两个世界，将农村、牧区、兵团视为改造知识青年，特别是惩罚、统治所谓“黑七类子女”及其父辈“黑七类”的场所。为此，演绎出一场积重难返的悲剧。由此，《通志》不得不适当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有关内容，借以阐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本《通志》的附录部分辑有资料辑存，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史料文献择要收录，为致力于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志士仁人提供确凿的历史依据。

## 一、知识青年运动

### (一) 知识青年的先驱

“知识青年”的称号源远流长。

民国 8 年（1919 年），五·四青年运动如一声春雷炸响在神州大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新民主主义思潮如决堤的江河波及到内蒙古地区。在北京城求学的一批内蒙古籍莘莘学子、热血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携手并肩返回故里。他们不避案牍之劳形、不辞奔波之憔悴，疾书文章、讲稿、传单，颠沛于故国的十里八乡，宣传新文化，寻求救国救民于水火之良方；他们奋笔撰写进步诗文、引吭高歌进步辞曲、激情排演进步剧目，为唤起民众，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付出不懈的奋斗。

民国 20 年（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祖国大好河山沦为日寇铁蹄的践踏之中。内蒙古地区的广大青年学生在“960 万平方公里上竟无处安放一张书桌”的惨淡现实面前，拍案而起、四处奔走、八方呼号，旨在“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在狼奔豕突的年月里，多少青年学生挺着脊梁倒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汨汨晶莹的青春碧血濡染着内蒙古高原的每一抔热土。

民国 28 年（1939 年）5 月 4 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的演讲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民国 34 年（1945 年）4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进一步提出：“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

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他所倡导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并且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在于“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在这一思想的感召下，知识青年之先驱不辱使命，抗日战争初期，山西省太原市成成中学的学生集体北上抗日，在大青山区浴血奋战，谱写出气壮山河的正气歌；东北战场和傅作义军中的青年学生满怀爱国激情，誓为“把强盗赶出去，把鬼子消灭光”殊死拼搏，创建下可歌可泣的辉煌战绩。值得一提的是，1947年5月1日，以蒙古族共产党人乌兰夫出任主席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成立，这个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第一个诞生的红色政权，犹如拔地而起的一株参天梧桐，顿使八方吉祥的凤凰云集。山海关外的白山黑水之间，燕山脚下的京畿之地，以及冀鲁平原、晋陕黄土高原和许多敌占区的青年学生，冲破重重艰难险阻，奔向塞外，为内蒙古地区的解放和建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九·一九”起义乃至剿匪镇反、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等各个时期，归绥、包头、通辽、赤峰、海拉尔、乌兰浩特、锡林浩特、集宁、丰镇、武川、萨拉齐、鄂尔多斯、临河、陕坝等市镇的中小學生，还有国内各大中专院校、“华大”、“革大”、“鲁艺”、“联大”、“抗大”等高校毕业的莘莘学子先后汇聚在内蒙古大草原，奉献出真情挚爱，奉献出心血汗水，奉献出无比珍贵的青春年华乃至生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各地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更掀起一股支援内蒙古生产建设和促进科教文卫事业发展的热潮。在广袤的锡林郭勒、呼伦贝尔草原，在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在腾格里、巴丹吉林大沙漠，在包头的钢铁基地，在矿山、井下，在工厂、工地，都留存着那一代知识青年的光辉足迹。听：“我们象双翼的神马，奔驰在草原上，啊哈嗨，草原万里滚绿浪，水肥牛羊壮。”这首歌，曾激励着两代青年去建设社会主义。

这批知识青年的先驱，放弃大城市较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有的甚至摒弃国外较优厚的待遇，多数在内蒙古自治区安家落户。他们的子女及至子女的子孫，又成长为后来的知识青年。知识青年的先驱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的丰功伟

绩，付出的伟大牺牲，可谓有口皆碑、彪炳青史，史料记述屡见不鲜。本《通志》为避冗赘重复之嫌，不再追述。

##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初级阶段

1955年4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同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关于高小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号召家住农村的初中、高小毕业学生如不能继续升学或在城镇就业，就必须返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或进行自学。内蒙古自治区团委要求认真学习、传达这一文件精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重视和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在青年学生中广泛进行宣传教育，批判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剥削阶级思想，树立劳动光荣的良好风气；号召并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此时，内蒙古广大农村、牧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如火如荼，新成立的农业合作社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缺少会计员、记工员。初中、高中毕业生回乡后，很受欢迎，他们所学到的文化知识被派上用场。毛泽东看到河南省郑县大李庄乡的《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批示为：“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中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5年8月5日至30日，北京市郊区回乡知青杨华等人率先响应中共中央有关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号召，组成“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一行60人（男48、女12人）奔赴黑龙江省萝北县安家落户，创建“北京庄”，垦荒种田，他们便是萝北县共青农场的奠基者。同年11月8日，又有天津市的52名知识青年赴萝北县插队落户，创建“天津庄”。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城镇知识青年集体上山下乡到农村（牧区、厂、场）插队落户的热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这样在全国范围内悄然启动。1958年7月，初中毕业的女知青邢燕子回乡在河北省宝坻县司家庄村参加农业生产，成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典型人物之一。借助于榜样力

量的推进，运用报纸、刊物强大的舆论宣传，一场由1955年开始为解决、安置农村户口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就业而发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变革，逐步扩展、演变为“文化大革命”中成批，大范围地安置高、初中和小学乃至大中专毕业学生劳动就业的主渠道。

但是，历史铭记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初衷，是为解决家住农村（农村户籍）的初高中和小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 （三）从精简城市人口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试行阶段

1958~1960年，以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殃及内蒙古的城镇乡村，农牧业生产在“左”倾错误路线误导下，造成全区国民经济大滑坡。特别是从1959年起连续3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更使农牧业生产雪上加霜，损失惨重，以致造成近乎民不聊生的境地。据统计，1960年粮食总产量跌落到1951年水平。城乡人民口粮平均减少19.4%，猪肉人均消费减少70%，在内蒙古自治区一些人口密集的城镇，竟然不供应牛羊肉。人们饥肠辘辘，严重营养不良，许多人患有浮肿病，死亡率骤然陡升；轻工业生产也急剧下降，一切日用品空前奇缺。受灾较严重的乌兰察布盟化德县、卓资县、丰镇县、察哈尔右翼前旗、察哈尔右翼中旗等地，逃荒要饭者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在全社会的一个怪异现象是，在“大干快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鼓噪声中，到处圈地建厂，大批招收工人，一面精简压缩城镇人口，大批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务农；一面又从农村或其他省市招收工人、职员进城。据国家劳动部门统计，1957年，全国有职工总人数3101万人，在纯增的1900万人中，有1000万人是从农村招收的。从农村招来的1000万人，是农村的青壮劳力；而动员到农村去的“城镇闲散人口”和中小学毕业生，则是不会种地的娃娃。内蒙古自治区有些城镇也在这种“换血”的怪现象中出现社会不稳定，造成工厂不能投产，大批工人干部的工资、口粮、住房等一系列问题无法解决。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制定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要求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础上3年内减少2000万人以上，其中职工1160万人；1961年内要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以上，其中职工970万人。同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精简的主要对象是1958年1月以后来自农村参加工作的新职工，要求他们返回原籍（农村），参加生产劳动。1957年底以前来自农村参加工作的职工自愿要求，也可以离职回乡。《办法》和《通知》所指的“精简的主要对象即前文所说的涌入城市的农村青壮劳动力，当时被称之为‘盲流’”者。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根据国务院有关指示确定1962年精简计划的各项指标，决定在1961年压缩城镇人口基础上，再压缩精简城镇人口。1962年10月，国务院农林办主持召开的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指出：在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下放的职工和不能升学的青年学生的工作，是圆满地完成这次精简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内蒙古自治区为此还组成专门领导小组，设立专门办事机构，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并转发中共中央《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的通知》，使“缩短工业战线、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意义深入人心，明确精简的职工主要安置到农村。凡来自农村、能够回乡的，都应当说服他们回到本乡的生产队中去参加农业生产。对于精简下来无家可归和城镇无法安置、但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安置到农场、牧场、林场、渔场。据统计，1960年，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为1191.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59.8万人，农牧业人口831.3万人；1961年，总人口为1163.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19.1万人，农牧业人口844.0万人；1962年，总人口为1171.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77.3万人，农牧业人口894.5万人；1964年，总人口为1253.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49.1万人，农牧业人口1004.6万人。自1960年到1964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共减少城镇人口110.7万人。这其中包括部分初、高中毕业生。

1958~1965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始终把精简下放城镇人口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如昭乌达盟，1958~1960年上半年，共增加职工52283

人，其中来自农村的有3万人。从1960年9月开始精简职工至1963年共实施精简37938人，其中干部7862人。全盟共下放干部5999人。基本上做到有组织、有计划，还取得一定经验，此后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知识青年（主要是回乡知青和下放知青）到农村、牧区落户。此即“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前奏和序曲。

#### （四）“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强制实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6年6月至1976年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内蒙古自治区几十万初中、高中、大中专院校的师生卷入震撼世界的红色风暴之中。红卫兵小将们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狂热地走向街头，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和雪片似的传单，张贴、挥撒到每个角落。一时间，被无端冠以“牛鬼蛇神”的走资派被批、被斗、被关；被说成是“封资修”的物什、服装、书籍被砸碎、焚烧、销毁。城外的农民扛着铁锹涌进城内，扬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城里工厂的工人停工停产走出厂门，开着卡车在市区游行，声称“坚决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于是，“左派”和“右派”、“革命派”和“反革命派”、“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展开旷日持久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继而发展到械斗、枪战。生活在同一块黄土地上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人们，像着魔似的互相仇视、互相厮杀、互相摧残。

痛定思痛，回眸审视这场浩劫的主力军，竟是数以千万计被愚弄利用的“革命小将红卫兵”——中学生。令人“长太息以掩涕兮”！当这场“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祖国山河一片红”告一段落时，教育战线已成为重灾区。署名“王亚卓”的3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惊闻在混乱的教育战线上弄潮的北京市海淀区小学生黄帅的言论，试图以正义、善良的言辞晓之以理，却被“四人帮”的爪牙当作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典型横遭几致灭顶之灾祸。于是，这场“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就已经从这一代数以千万计的人的身上掠走两三年的宝贵年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级各类学校已积压着三届毕业生，社会的动乱，生产的停顿，经济的萎缩，使城市丧失大规模吸纳就业人员的能力，于是“容易犯错误”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的归宿在哪里呢？只有“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插队知青”这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伴生的名词和由这个名词集结的群体由此而生。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陌生的生活、陌生的劳动，围困着他们，竟然在三五年乃至十几年后，仍然不能改变这些知青娃的初衷，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掏厕所、扫大街也要回城去”。他们用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青少年时光去沾一身泥巴，去镀一层金，最后绝大多数人还是得回到那个原本生育他们的地方。当时，在某些人的心目里，城市里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军人的子女，似乎只有到农村去接受一次农民的“再教育”，才能成人、成才。知识青年到那里去，已不再是“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而是将这一切都翻过来。工人阶级在自己子女的问题上，似乎也不再“领导一切”。或者说，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这样一个政治口号中的工人和解放军的子女，要翻过来被贫下中农和贫下中农子女“再教育”一番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青年”或“革命接班人”。然而，内蒙古地区农村、牧区当时的现实却是，交通闭塞，文化、教育、卫生条件差，愚昧落后的阴霾还在浓郁地笼罩着一些农村、牧区。一件衣服穿一年不下身，一年洗一次脸，生来没刷过一次牙的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不乏其人。产妇用自家的剪刀剪断脐带“自我接生”者司空见惯；接生婆用“猪油胰子”洗手助产，算是上乘的“大夫”。即使这样，依然单纯强调知识青年要接受“再教育”，而恰恰淡化“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一现实情况。在“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口号下，这群像冲出笼子的小鸟般的青年学生，被驱散在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的大草原上。昨天还在激扬文字搞“斗、批、改”，今天则在蓝天白云下冷静地去面对人生、面对现实、面对肚子挨饿该怎么办？昨天还在“拿起笔，作刀枪”，今天却要扛起锄头修理地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扭曲、走样，演变成为一种政治色彩浓重的运动，对于“红五类”家庭出身的知青，去兵团、去农村、去

牧区尚有选择余地，或者采取拖、等、靠的对策去躲避上山下乡。个别高级领导人的子女，还可以“走后门”早日被招工、招生回城；军队中军官的子女，可以通过关系“转移”到别的部队去参军入伍。有的农村中的党支部书记、贫协主任、生产队长，哪怕是一名大队会计，也可以乘“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这个机会而把自己刚刚念完小学或在小学辍学的子女巧妙地送进大学，既然是“工农兵大学生”，而且不举办入学考试，贫下中农的子女念大学自然是情理中的事。还有的招生办、知青办并其他有关单位，把较好的学校、较好的指标和名额留给自己或亲友的子女，此中奥秘，广大知青一直被蒙在鼓里。在农村、兵团孳生的毒苗，每遇适宜的条件和环境，则滋生、繁衍，一些无视党纪国法的“领导干部”和独霸一方、持强凌弱的不法之徒，竟借机将其罪恶的黑手伸向丝毫没有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的知识青年。这期间，强奸女知青、勒索男知青的犯罪事件层出不穷，性质、手段之恶劣，迄今谈起仍令人发指。“黑七类”家庭出身的子女，则更是另一种命运，只能按指令老老实实到某地去插队落户。遇罗克的《出身论》也只能作为一篇论文读读而已，没能挽救“黑七类”子女的命运。他们最终只能在“掐尖”、“拔根”后，随已经在农村成家立业的“老三届”知青“统筹安排解决”。1967~1976年的10年中，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峰期。据统计，各盟市旗县城镇居民的子女及全国各地先后来内蒙古农村、牧区“上山下乡”插队、插包、插场，接受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再教育”或奔赴生产建设兵团“扎根边疆干革命”的知识青年，以及当地的回乡知识青年、下放知识青年即达100万人。20世纪60~70年代的内蒙古自治区，共有1400万人口，平均14人中，就有一名知识青年。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额济纳旗，是土尔扈特部祖居的地方，早在300年前，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率部冲破沙皇的重重围追堵截，回到祖国的领土，被清政府安置到居延湖畔繁衍生息。1968年，该旗总人口为8765人；而该旗1968~1980年，先后安置天津市、兰州市、国防科委二〇基地和本旗的知青1204人，每7.3个人，就面对1名天津或兰州市的知识青年。在内蒙古这块土地上，接纳这批知青娃，需要多么广博的天地，多么宽厚、善良的人群啊！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触目

惊心的数据，它牵动着内蒙古自治区 300 多万户家庭和 1 400 万各族人民一颗颗惴惴不安的心。牵动着共和国半壁江山！

这 100 万人，有本区历届毕业生；有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沈阳、长春、黑龙江、甘肃、河北、山西、宁夏、陕西、浙江、四川等省、市、自治区的近 200 个地市旗县，从 1967 年（甚至更早）至 1980 年先后安置到内蒙古地区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及大中专和小学毕业生，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初中毕业生。

这 100 万人，有“红五类”子女，有“黑七类”子女，有不愿透露身份的中央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也有城市孤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 1962 年 10 月召开的首次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上说：“安置到农村去的学生，一般要求年纪要到 18 岁的青年，再小了下去不能参加劳动。”但当时为动员大批知青下乡，顾不得那么多，只要报名，就批准下乡。这批人中年龄最大的 25 岁，最小的仅有 14 岁。而 14 岁与童工有何本质的区别呢？

这 100 万人，有志愿报名到内蒙古决心在祖国边疆安家落户、干一辈子革命的青年学生；有父亲替儿女报名，一次就把身边的 4 个儿女送到农村的革命工人；有被说服动员下乡的学生和待业青年；有迫于形势而不得不下乡的领导人的子女；还有因父母亲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被迁返回原籍或偏远山区，只得随父母接受改造的青年学生。为使这 100 万知识青年在生活上有人管、学习上有人问、劳动上有人教，内蒙古自治区各级党政机关派出数万名职工干部专司此事，面对这实实在在的一支“百万大军”。他们需要吃饭、穿衣，他们要有一个接受劳动锻炼的场所，要有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而只有内蒙古草原这样宽广的襟怀和憨厚朴实的农、牧民，才能无私地为如此众多、不会干农活、不会放牧的青年学生提供生活、学习、劳动所需的一切；才允许他们用青苗去搞实验，用活羊去进行研究；才允许他们站在大草原深处，在蓝天白云下面大喊，骑着马去狂奔；才能容忍他们那还没有完全脱离稚气的近乎顽皮的恶作剧甚至触及法纪的行为。

造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混乱局面，还因为“双考一招”、“双退”、

“双留”、“转调”、“顶替”等政策的实施，使得已经插队到农村、牧区的知识青年人心浮动，以至达到完全失控的局面。显然，再不出台新的政策，局面更难收拾。

### （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

从1976年起，由于国内经济形势明显好转，政治局势日趋稳定。党中央、国务院开始就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进行政策性调整，采取多渠道、多策略、多视角的安排方法，将历年来下放到农村、牧区、农场的知识青年和社会待业青年分期分批、有计划地安排就业或再就业。1977年，国务院召开由华国锋主持的全国第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有关负责人与会。大会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总结，有关领导和与会代表普遍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劳民伤财，费力不讨好。特别是国家为此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代价得不偿失，最后造成学生本人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村社员不满意、整个社会不满意。用哲里木盟一位领导干部的话说：“筹建一个通辽市玻璃厂才用3000万元，用这么大的资金安置知青，绕一圈又把他们弄回城去，简直是浪费。”至此，国务院决定从此以后不动员城市学生去农村、牧区安家落户，改上山下乡为办知青点集体劳动，或在城镇创办集体企业，国家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并将已经在农村、牧区安家落户的已婚知青和那些蒙难更深的所谓“黑七类子女”陆续安排就业。至1981年，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基本结束。内蒙古有全国十几个省区的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属于重点省区。知青人数众多，情况复杂，遗留问题盘根错节，直到1984年，许多善后事宜才在落实有关政策和自治区各级知青办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下得以解决。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特为1972年以前下乡的“老三届”和已婚知青出台优惠政策，统筹安排就业，以期不留后患。仅从1967年以来，共和国为之付出的财政支出即高达数百亿元之巨。其10余年间，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市，先后多次

组织慰问团队来内蒙古农村、牧区，慰问千里支边的家乡的青年学生，并且将大批农用物资、交通工具、建筑材料、医疗器具、药品、书刊等，无偿地运往内蒙古，以支援边疆的经济建设；资助家乡儿女的生活、劳动、学习所需。全社会都在同情知青的命运，全社会都在痛恨那些贪污知青经费、挪用知青物资、挤占知青房屋、盗窃知青财产的罪恶行径。

想当年，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族人民，都像对待自家的孩子一样，关照、呵护来自天南海北的知青娃娃，他们为此付出沉重、巨大的代价。那些曾经熔炉历练并对人生、对社会有新的感悟的知识青年获得机遇参加工作后，遍及内蒙古自治区及国内外各条战线，在改革开放大潮涌来的潮头浪尖彰显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态势，创建出业绩和功勋。当年的知识青年们，由衷地向故乡的农牧民致敬罢！把农村、牧区作为第二故乡，深情地拥抱，实在是情理中的事。

## （六）经验与教训

知识青年尽管饱经忧患，历尽挫折，但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无论他们是主动要求下乡插队，还是被强制动员的，到农村、牧区或兵团、厂矿后，都努力劳动，与农牧民打成一片，希冀在那里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美好的理想。很快，他们中的许多人先后成为生产骨干甚至社队主要领导人，有的成为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牧机手、财务人员等，将文化、信息带到农村、牧区，将活力带到农村、牧区，以至在他们的原籍城市与偏远的农村、牧区架起勾通、联系的桥梁，这对内蒙古农村、牧区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然而，这一代青年毕竟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战车上，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甘寂寞，他们愿有所作为的意识，受极“左”路线的影响使他们敢于成为农村、牧区阶级斗争的急先锋。他们曾经积极参加农村、牧区清理阶级队伍、挖肃、大批判、整党等运动，伤害到各族群众。他们也曾积极投入农、牧业学大寨运动，在“上级领导”的号召下，在内蒙古草原开荒种地、建饲料基地，从事违反自然规律、破坏环境的“改天换地”斗争，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他们的错误，内蒙古的农、

牧民将他们看作自己的孩子做错事，正确、真诚地对待他们、谅解他们，使他们更认识到内蒙古人民的真、善、美，从而更拉近彼此间的感情。

在当时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农村、牧区是人民公社化的集体经济，生产力低下，耕地少，畜群少，农牧民生活水平低。知识青年在这种情况下，单靠着一种政治热情，想实现宏伟抱负、实现自己理想的人生价值取向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当他们最终认识到这点时，他们陷入茫然、苦闷、矛盾。内蒙古的农牧民理解他们、关爱他们，努力地、尽可能地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送他们上学、招工、招干。可以说，在招工、升学、参军乃至后来知青出据各种“理由”而要求返回城市这个问题上；农村的农民、牧区的牧民、工厂的工人，几乎没有人阻拦、刁难他们，尽管因知青大批离开农村、牧区乃至工矿企业而造成许多生产队无会计、乡村小学校无教师、工厂停工、乌兰牧骑停演、诊所停诊，而内蒙古的人民还是含着热泪送他们去上大学，回城去重新寻找工作，去圆他们的梦，去“二次创业”。草原上的人们永远记着这一代青年，这种无私的真挚也使知青永世难忘。而这一代知青后来无论走在天涯海角，都怀念着内蒙古，与草原上的人们心心相连。

时过境迁，回首中国 20 世纪 60~70 年代，在中国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前提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到缓解城市人口就业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支援着农牧业建设，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起到一定作用，做出一定贡献，同时也使知青本身得到锻炼。但是，大批知青失去应该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而去农村、牧区参加长达 2 年以上甚至十几年的体力劳动，造成知识化人才成长的断层，不仅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严重的负面影响，也给千千万万家庭造成心理的影响以及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尽管国家还是没有真正解决城市就业困难问题，但事实证明，把城市就业难的包袱甩给农村，此路不通！而这一问题最终只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得以切实的解决，这也是新中国漫长实践所汲取的教训，这批知识青年便是“试验品”。上山下乡曾是一代青年实现理想和自身价值的一段寻觅、一段历程，它充满曲折、艰难，象共和国所走过的那一

段路一样。这一代与共和国同龄的青年，他们的命运也是共和国的命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面对国家有关就业问题难以解决的情势，这一代以天下为己任的青年，用稚嫩的双肩承载起国家的危难。他们与共和国一道，有着“文化大革命”10年的痛苦和茫然，10年的奋争和寻觅。这里要大喊一声：“我们的知识青年是多么可爱啊！”再者，知青在农村、牧区认识社会，认识农牧民群众，体验生活的磨难和艰辛，使他们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以及把握命运的能力，这使他们在以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受益匪浅。经历过这段曲折的生活、痛苦的历程，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家落户”这条路行不通，终为历史所证明。但一代知青并没走下历史舞台，他们紧跟时代步伐，在共和国的新长征中又创造着新的业绩。即使是仍留在农村、牧区基层的知青，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少人成为弄潮儿。一代知青用宝贵的青春，填平共和国为谋求社会发展道路的凸凹不平，最终找到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也使一代知青获得新的青春和生命。后代将不会再去复蹈前辙，历经磨难。

今天，知青所回忆的，是草原上人们的真诚和善良，特别是所谓的“黑七类”子女，在那里都曾得到过草原的善待，老牧民并没有看重“黑七类”与“红五类”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广博的内蒙古对他们有养育之恩。诚然，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与作用下，面对许许多多被扭曲和愚弄的人，一些“黑七类”出身的子女受到程度不同的伤害，是不能避免的。加之封建势力的残存和在知青聚集地区的个别邪恶势力的影响，甚至连“红五类”的男女知青都受到迫害，莫说“黑七类”。今天，知青所回忆的，是青春的热情和理想的执著，是克服过艰难困苦的去逝的难忘岁月。打着计划经济烙印的上山下乡运动已成历史，在反思过去的时候，他们更珍惜今天，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改革开放，已经给一代知青，特别是他们的后代开拓出更加广阔的施展聪明才智的新天地。当年的农牧民子女，今天不少已走进城市，成为发展经济的生力军。城镇化将成为历史的必然。而将后城市里的知识青年，再也不必担心为“减轻城市负担”而到农村、牧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历史的重演。